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AI GUO ZHU YI JIAO YU CONG SHU

★ 第八卷 ★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第八卷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本卷目录

沈钧儒

一、早年留学日本	(3)
二、主张立宪救国	(5)
三、投身革命	(9)
四、“我是中国人”	(17)
五、救国运动的旗手	(23)
六“七君子”的“家长”	(30)
七、坚持团结抗日	(36)
八、反对内战,拥抱新中国	(43)

廖仲恺与何香凝

一、天缘巧合结良缘	(51)
二、东瀛留学显头角	(53)
三、广东共和奠基石	(61)
四、讨袁护法卫共和	(64)
五、身陷囹圄斗叛逆	(69)
六、联俄联共中砥柱	(76)
七、筹建黄埔搏军阀	(82)
八、承继遗志真女杰	(89)

邹韬奋

一、学生时代	(99)
二、“曲线”求职	(105)
三、《生活》周刊	(111)
四《大众生活》	(118)
五、“七君子案”	(123)

六、抗日怒吼	(129)
七、赴解放区	(136)
八、英年早逝	(140)

闻一多

引子	(147)
一、童年生活	(148)
二、入京求学	(150)
三、活跃在清华园	(151)
四、留学美国	(156)
五、诗人情怀	(161)
六、学者风范	(164)
七、迅猛的转变	(166)
八、民主斗士	(172)
九、迎接新的挑战	(177)
十、愿与各界紧紧握手	(181)
十一、气壮山河的讲演	(184)
十二、血沃中华	(189)
十三、尾声	(191)

七君子事件

一、救国救民 无畏无惧	(195)
二、“爱国有罪” 举世冤案	(200)
三、热血七君 名垂千古	(206)
四、风雨同舟 患难与共	(220)
五、义正词严 力驳诬陷	(225)
六、声援营救 谴责暴政	(233)
七、“爱国无罪” 永留史册	(238)

沈 钧 儒

张连荃 编著

一、早年留学日本

1963 年元旦，在政协礼堂三楼大厅里，布满了鲜艳的一品红和常青棕榈树，洋溢着欢乐的气氛，在这里，全国政协举行宴会为沈钧儒老先生 90 岁生日祝寿。沈老坐在第一席首宾位。当时任政协主席的周恩来总理主持祝寿，并致祝辞，周总理指出：“沈钧儒老人今年九十岁，我们为他祝贺，沈老是民主人士左派旗帜，他曾经为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奋斗到老。”半年后，即同年 6 月 11 日上午 3 时 55 分，沈老走完了他 90 年的人生道路。

沈钧儒，字秉甫，号衡山，浙江嘉兴府秀水县（今嘉兴市）人。1875 年 1 月 2 日出生于苏州。他的曾祖父沈濂，曾任镇江、江宁、徐州等地的知府。祖父沈玮宝，曾任苏州知府。父亲沈翰做为江苏候补知县客居苏州。可见沈钧儒出生成长在晚清一个封建士大夫的家庭。从小所接受的教育则是传统的文化教育，在 3 岁时他的母亲就开始教他识字，长到 5 岁时就进私塾受启蒙教育。13 岁时回到秀水县老家应童子试，16 岁考中秀才，29 岁中举人。1904 年参加甲辰恩科会试，中试贡士第 51 名，殿试二甲第 78 名，赐进士出身。1905 年清朝废除科举考试，因此沈钧儒也就成了沿袭一千多年的科举取士最后一批进士之一。

沈钧儒的青少年时代，正是清朝走向衰落的时期。自 1840 年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接踵而来，用洋枪洋炮打开古老中国的大门，签订了一个又

一个不平等的条约。此时的大清帝国全没有了康(熙)乾(隆)盛世时的威风了。祖国的大好山河被列强瓜分的支离破碎。老百姓在水深火热中痛苦地挣扎,而清朝廷则更加腐败、死气沉沉全无生机,洋人在中国肆意横行。特别是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中,清朝败北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大大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使中国人民深深感到由此下去必然亡国。于是他们觉醒、他们反思、他们奋起自救。人民起义的烈火在各地燃起,而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一批爱国的知识分子则开展了变法图强的运动。

国家的衰落,民族的危亡激起了沈钧儒极大的爱国热情。他大量地阅读康、梁有关维新变法的文章,并深受影响,相信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能使国家强盛起来。沈钧儒中进士后,本可以到京城谋取官职,从此过上安乐生活,然而为国家命运而担忧的他放弃为官,毅然东渡日本,谋求救国之道。

日本原也是闭关自守的封建国家,然而自1868年明治维新后,国力很快强盛。1894年中日战争打败了大清国,在1904年日俄战争中又战胜沙俄。这就使一些中国人对日本另眼相看。认为学习欧美,不如学习日本,又由于日本距中国较近,文化前景相同,所以去日本留学的人数逐年增加。从1901年的280人猛增到1905年的8000人。在这些中间,有一部分人认为,日本之所以强大,原因就在于实行了君主立宪制度。而中国要想由弱变强也要仿效日本,实行君主立宪。正是因为这种认识,他们到日本留学,主要就是学习日本的立宪政治。1905年沈钧儒也是基于这一思想,进日本东京私立法政大学

学习的。在踏上日本国土时沈儒就感受到一种在中国所没有的新气息，所以他发奋努力去接受学习新的知识。在中国他已是进士了，可以说有很深的造诣，但他仍不松懈，孜孜以求，有时连暑假也不休息，全力投入学习。仅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就学完了正规三年才能学完的课程，而成绩比正科更为优异。

沈钧儒和当时大多数留学生一样，同是抱着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来日本的。所以学习之外他还广泛地接触留学生中的各式各样人物。当时留日学生大体分为两类，一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他们认为清王朝对内奴役镇压人民，对外妥协投降丧权辱国，是帝国主义的奴仆，这样极腐败的朝廷，只有用革命的方法，将其彻底推翻，代之以共和国，才是中国的出路。另一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保皇党，他们认为中国需要的是改革而不是革命。革命会招致列强的干涉瓜分，中国会有亡国的危险，因此保皇就是爱国。只要实行君主立宪，就可以使中国富强，国内一切不平等也就随之消失了。沈钧儒与两派人物都有联系。在这种广泛的接触中，打开了眼界，拓宽了思路，并逐渐地摒弃了陈旧的观念，用新的方式认识中国，认识世界。然而沈钧儒的个人经历和所受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教育，使他不可能接受革命的思想，而是走上了主张君主立宪的改革道路。

二、主张立宪救国

甲午中日战争，清朝战败。随着《马关条约》的签订，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程度大大加深了，民族处于危亡的生死关头。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并于1901年签订了《辛丑条约》，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衰败的清政府已经成了“洋人的朝廷”，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中国的民族灾难更加深重，人民的反抗斗争也就此起彼伏。特别是在辛亥革命前十年，以推翻清王朝为目的革命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国内革命形势迅速高涨的震撼下，清王朝统治集团中的一些显赫人物，如驻外大臣、督抚、尚书、侍郎等纷纷要求制订新的策略以挽救朝不保夕的清王朝。1905年清政府派五大臣到欧、美、日本各国“考察政治”，表示考虑实行宪政问题。1906年五大臣考察归来上奏朝廷认为实行立宪有三大好处：第一，可以永远保住皇位；第二，“外患渐轻”；第三，内乱也可以阻止。清政府终于在1906年9月颁布预备仿行宪政的上谕。同时又宣称，不可操之过急，待日后条件成熟，再参照其他国家宪法，确定立宪的具体日期和内容公布天下。由此可以看出，预备立宪实在是敷衍欺骗舆论。但是它毕竟公开许下了同意立宪的诺言，对国内及留学日本的立宪派是个极大的刺激。于是各地的立宪团体纷纷建立，一时间掀起了一个立宪运动的高潮。1907年杨度和熊范舆创立宪政讲习所，目的在于宣传宪法政治，为今后实行法治服务。沈钧儒是该组织的重要成员之一。为督促清廷建立民选议院，沈钧儒和熊范舆等人带头联合一百多人署名向清廷上奏一份《民选议院请愿书》，强调开设民选议院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是当时第一份要求开国会的请愿书，所以发表后很快在国内外引起极大反响。做为倡导者之一的沈钧儒也就成为引人注目的人物。1908年当沈从东京法政大学

毕业回国后,就受到朝廷密探的监视,后经多方面活动才脱离危险。然而这一小插曲并未影响沈钧儒继续从事立宪派活动。他与杨度等人一道又在北京设立宪政公会(即宪政讲习所改名)。由于他们在立宪活动中的影响,所以前来参加的人纷至沓来,从而使宪政公会的影响、活动、声望大大提高,再加上梁启超创办的政闻社也移到上海,很快在国内就形成了一场活跃异常的立宪运动。为了使朝廷实行真正的立宪,沈撰文《论预备立宪要旨》,他认为,立宪变法,不能不把握最主要的方面,只从枝节上谈变法,这种所谓的立宪其危害,甚至会大于不变法。

清廷宣布预备仿行宪政本为形势所迫,目的在于消除革命。而现在全国各省立宪派运动声势日益壮大,清廷于1908年8月颁布《钦定宪法大纲》,确定以九年筹备立宪的期限。其中第一、二年规定筹办谘议局,各省举行谘议局选举工作。谘议局是清朝专制统治下的一种改良的产物,是为预备立宪而设立的地方谘议机关。它的权力是讨论本省行政兴革和公债税收等,它通过的议案,只有经过该省督抚同意方能生效。如被认为有对朝廷的不恭,妨碍国家治安的,督抚就有权将其解散。所以谘议局只能提出建议供督抚采纳,不能监督地方行政,也就起不到决策的作用。尽管如此,在清廷专制,人民无言论自由的国家,毕竟给立宪派提供了一个批评时机,进行民主宣传的合法讲坛。立宪派可以充分利用这个讲坛,或多或少,或主观或客观地反映人民的呼声,并能给清廷的专制卖国政策以一定的牵制。沈钧儒于1908年夏回到原籍探亲,由于他

在立宪活动中的影响和威望被浙江巡抚增韞留在当地筹备谘议局的工作。9月被委派为浙江谘议局筹备处总参议。1909年9月浙江谘议局成立,沈钧儒被选为副议长。在任职期间,沈钧儒发现,有外国人在杭州宝石山,湖州武康县境内莫干山买土地建房屋。此两地都是我国内地,并不是通商口岸,而依照以往中国与欧美日本所缔结的各种条约及通商章程规定,外国人的行为,是违反条约规定,侵夺了我国人民的权力,因此不可不争。于是在浙江谘议局会上沈钧儒提出《收回宝石山、莫干山地亩以保内地主权案》并建议巡抚下令,对上述地区进行地界勘察,命令外国人马上停止正在进行的房地产交易。对违令者要严加查办。同时设法筹款收回已卖给外国人的土地。这项提案反映了沈钧儒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反对外国肆意侵占的爱国主义精神。

随着各省谘议局的建立,立宪派又将要求清廷召开国会问题提到日程上来。立宪派认为有了立宪政体,成立了国会,就可使一些先进分子参加到政权中。从而通过国会对政府实行监督,最终达到清除封建专制的积弊,并能防止革命暴乱发生,国家由此富强起来的目的。于是立宪派在1910年先后发动了三次国会请愿运动。沈钧儒以浙江谘议局副议长的身份,前往北京,参加三次请愿。国会请愿代表于1910年1月上书都察院。半月后清廷以筹备并不完全,国民知识程度又未统一为理由,拒绝提前召开国会,请愿失败了。6月第二次请愿,此次比前一次规模大得多,入京请愿代表有150多人,各省签名参加请愿的有二三十万人,然而同样又遭失败。各省代表重新

协调行动,又进行第三次请愿。11月朝廷下谕旨,将预备立宪期由原定九年改为三年,除此之外,别无他议,请愿团并没有达到速开国会的目的。请愿实际上仍然是失败的。此次沈钧儒来京数月,与各方面的人士多方面接触,认清了清廷对预备立宪并无诚意,只是一种欺骗。此时兴起于全国的保路风潮和日趋高涨的革命风潮,使沈钧儒看到清政府已不能维持多久了,和许多立宪派人士一样,从立宪转向革命。

三、投身革命

保路运动是兴起于20世纪初,中国人民反对清朝将铁路修筑权出卖给帝国主义而发动的保护路权的革命运动。近代外国列强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中国享有很多特权,特别是筑路权的获得使帝国主义一方面可以随铁路的延伸,将他们的侵略魔爪也伸到我国各地;另一方面还享有铁路沿线两侧三十华里的矿山开采权,把我国丰富的宝藏掠夺走。于是各帝国主义纷纷与清朝签约,通过筑路权的获得,在中国攫取最大的侵略利益。此时清政府采取的却是媚外卖国的政策。1911年1月大买办盛宣怀就任邮传部尚书,向清政府提出把各省“商办”铁路“收归国有”,并向帝国主义国家借款兴办的方式把路权拱手交给帝国主义列强。这种出卖民族利益的政策,必然激起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人民的革命思潮在不断发展,爱国主义运动持续高涨。

在各省保路运动中,以四川的反抗风潮尤为炽烈,并成立保路同志会。四川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令清政府非常害怕。于

是一方面命四川反动军警进行镇压,同时从湖北火速调兵前往。就在鄂军西调不久,在湖北的武昌,革命党经过多年努力已建立较雄厚的革命基础。于是利用湖北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机会,在武昌打响了起义的枪声。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是国内阶级矛盾尖锐,人民反抗怒潮不断高涨的必然产物。武昌起义后,湖北宣布独立,成立湖北军政府。陕西、湖南先后响应。随后很多省纷纷起义宣告独立。11月3日沈钧儒到巡抚院劝说增韞赞助独立,增韞不同意。4日浙江省新军起义,5日起义成功,通电全国宣布浙江省独立。立宪派和革命派共同推举立宪派领袖汤寿潜为都督,为尽快控制浙江的局势,沈钧儒等电促汤寿潜尽快上任。沈钧儒被任命为临时警察局长,任职后沈钧儒以极大的热情致力于维护社会秩序的工作中。在浙江光复的最初几天里,一些死命效忠清廷的顽固分子,并不甘心失败。他们表面老实,在暗地加紧活动,私藏枪支,伺机向革命反扑。其中首要分子是原清军旗营协统贵林和他的儿子。在浙军抓获贵林父子后,沈钧儒作为警察局长及时对二人进行审讯,并根据他们的罪行判处死刑。这一行动狠狠地打击了反动的复辟势力,大长革命志气,人心大快,浙江的革命形势和社会秩序大为好转。在沈钧儒任局长期间,还有一个叫梅藤根的英国人,他在杭州开设广济医学堂和广济医院。他想在杭州西湖保俶塔一带圈占一块工地作为英国侨民的居住地。此人为达到圈地的目的,特意请沈钧儒到他家作客,对沈大献殷勤,准备了丰盛饭菜茶点款待,还说了许多奉承恭维的话。为表示关系密切还请沈钧儒听他女儿弹钢琴,总

之想尽办法拉拢沈钧儒。然而这一切全是徒劳的。沈钧儒不为所动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西湖圈地就如同在杭州又开一块租界地,中国人民是决不会答应的。同时派警察在这一带严加巡视以防他人非法占入。从而维护了祖国的尊严和领土不受侵犯。

武昌起义后,革命形势迅猛发展。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和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使民主共和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然而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使政权最终落到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里。这一切没有动摇沈钧儒继续革命的决心。1912年浙江省成立临时省议会,他任议员,并任省教育司司长。这年的5月他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同盟会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政党。参加同盟会是沈钧儒由立宪派转为革命派的一个转折点,是他人生中的一大进步。

1912年3月袁世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支持下篡夺了临时大总统的职位。在民国初建、国内要求民主政治的气氛还很强烈时,袁世凯还不敢公开反对民主政治。于是他玩弄两面手段,表面上装模作样地要:“竭尽全力,发扬共和之精神”,而在暗中加紧实行他的独裁统治。孙中山为限制袁世凯独裁统治,向参议院提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然而这一约法根本无法保护共和制度和限制袁世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宋教仁希望以议会中的多数来组织“责任内阁”实现“政党政治”,从而杜绝专制和独裁的出现。于是1912年8月以同盟会为基

础联合几个小党派建立国民党。为使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取得多数席位，宋教仁开始奔走各地，积极进行竞选活动。然而这对于一心要建立独裁统治的袁世凯来说是巨大的障碍。就在宋教仁的竞选活动获得成功时，袁世凯派人暗杀了宋教仁。袁世凯破坏民主共和的行径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孙中山发动了讨袁的“二次革命”，结果被镇压了。袁世凯为达到独裁的目的，又极力用“民主”“宪政”来粉饰自己。他纠集一些拥护者，着手制定有利于自己的所谓宪法。中国的民主、宪政遭到践踏。为了维护真正的宪政，沈钧儒和国民党的部分温和派及进步党人士于1912年10月组织民宪党，宗旨是：“贯彻民主精神，厉行立宪政治。”并表示：不屈身于金钱权势，为祖国赤胆忠心，竭尽全力维护国家民主政治实行。袁世凯对限制他专权的组织是不允许存在的。他想尽办法，用尽手段，使民宪党最终被解散了。

袁世凯为实现当皇帝的梦想极力寻求帝国主义的支持，帝国主义列强也希望袁世凯成为他们统治中华的工具，以此扩大他们在华的利益，德、英、美等国先后怂恿袁世凯称帝。日本也以支持袁称帝为条件，乘机大捞好处。1915年5月9日袁接受日本提出的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得到列强首肯，袁世凯加紧复辟帝制的活动。12月31日袁下令改明年为“中国民国洪宪元年”，准备在元旦正式登基做皇帝。袁世凯的卖国复辟行径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早在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组建中华革命党反对袁世凯的专制，黄兴成立了欧事研究会，沈钧儒在上海参加了这一组织。当袁称帝时，孙中山发表

《讨袁檄文》，举起了护国旗帜，蔡锷、康继尧、李烈钧在云南积极响应宣布独立，并成立护国军。此时沈钧儒与国护军取得联系，协助护国军采取一致行动。1916年4月12日浙江脱离袁宣告独立，成立都督府，沈钧儒在政府里任机要秘书，参与了当时一系列军政方针的制定。

袁世凯的复辟帝制活动在全国人民反对下被迫停止，袁世凯也由于众叛亲离在全国人民唾骂声中死去。然而掌握北京实权的段祺瑞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1917年孙中山南下广泛倡导护法运动，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国民党国会议员纷纷南下。在后来的国会议员会上，沈钧儒由候补议员递补为议员。此时沈钧儒正在上海为母亲服丧，在接到参议院公函时，立即打点行装赶赴广州，积极参加到护法运动中去。在此期间他一方面为反对北洋军阀势力而奔走，不怕辛苦到福建鼓浪屿、漳州等地组织军事行动，另一方面则立场鲜明地表示不向军阀政府乞求和平，更不可牺牲护法原则。

1919年5月4日爆发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伟大革命运动——五四爱国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英、法、日等国家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中国以“一战”战胜国身份参加了这次会议。北洋军阀政府在人民的压力下，向和会提出希望帝国主义放弃在华特权，要求取消“二十一条”和收回山东主权的的要求，然而这些正当的要求，却被与会的帝国主义国家无理地加以拒绝，腐败的北洋军政府竟然准备在和约上签字。消息传出，举国上下一片愤怒，最终引发了声势浩大的爱国运动。这次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转